

民俗采风

新女婿上门 吃鸡蛋

王锦远

邻居家添了个大胖孙子，天刚蒙蒙亮，邻居大嫂就乐呵呵地拎着一只竹篮来送喜蛋。望着十枚红彤彤的喜蛋，我的思绪恍惚间便被拉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乡下。

过去在牟平乡下，家家户户的橱柜顶上总蹲个黑陶罐，罐口盖着一块粗布，里面卧着十到二十几个鸡蛋。在彼时，这些鸡蛋比银元还金贵。老娘们每天拾蛋时都要把鸡蛋在手里转着圈儿擦，软布蘸着细糠，擦得蛋壳锃亮，再对着日头照一照——蛋黄得像枚小太阳沉在中间，饱满得快要撑破蛋白，才算称意。这些蛋要么攒够十个拿到集市上换零花钱，要么留着给发疹子的孩子补身子，唯独新女婿上门，再抠门的丈母娘也要舍得做鸡蛋。

彼时，在牟平，尤其是在乡下，按照老规矩，新女婿一早就上门来接亲，而女婿进门，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，面条里还得卧着两枚雪白圆润的荷包蛋，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。谁也说不清是哪年传下来的，只知道面条要擀得细细的长长的，像条走不完的长路；荷包蛋得圆得溜边，咬开时蛋黄要顺着嘴角淌，像日子里淌不完的甜水。

1977年5月16日，是三婶家大喜的日子——我大姐要出嫁。头天夜里，三婶便早早搬下了那个老陶罐，就着昏黄的油灯光，挑了又挑，最后才郑重地拣出两枚壳上带着淡淡红斑的大鸡蛋——老辈人都说，这叫“见红有喜”。

天刚蒙蒙亮，三婶手里的擀面杖就在案板上敲得“咚咚”直响，那动静，就像是给新女婿擂起的欢迎鼓。忙活完案板上的活儿，她又赶到灶间，我妈早已蹲在灶门前，正用火棍细细拨弄着灶膛里燃烧的玉米秸。火苗不疾不徐地舔着锅底，待锅里的水泛起细珠似的“虾眼沸”，三婶郑重地拾起一枚鸡蛋在锅沿轻轻一磕，拇指捏着裂缝顺势一掰，蛋液便如同一条欢快的小鱼儿，“哧溜”一声滑进了水里。紧接着，她又拾起另一枚照样操作了一番。随后，她抄起挂在墙上的笊篱悬在水面上，眼珠子一眨不眨地盯着——一直等到蛋白边缘微微卷了边，像镶了一圈精致的白边儿，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荷包蛋捞起来，生怕碰破了那层薄薄的油皮。而后，三婶又将切好的细面条放在沸水里打了个滚，捞进粗瓷碗里，浇上点韭菜卤，绿莹莹的，最后把那两枚荷包蛋轻轻放上去，蛋白上还撒了几粒切碎的葱花，再摆上两根青青的菠菜，白的、黄的、绿的，衬得格外好看。

县城来的新女婿捧着碗，脸涨得通红，筷子头刚戳下去，金黄的蛋黄就顺着面条流下来，他“吸溜”一口，烫得直咧嘴，舌头伸出来半

天收不回去，却连说“香，真香”。三婶在灶边笑得眼角堆起褶子，偷偷拽着我妈的袖子说：“你看这孩子，吃蛋都这么实在，错不了。”

可这鸡蛋的分量，有时重得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我们村西头老黄家就栽过这么个大跟头。那年闺女带对象上门，亲戚来了两桌，屋里屋外闹哄哄的。操着一口外地口音的黄大妈在灶台边转得像陀螺，手忙脚乱地煮面，忙中出错，给新女婿端去的碗里，竟忘了放荷包蛋。小伙子没吭声，筷子在碗里挑着面条，挑起来又放下，嘴角那点笑像被冻住了，半天没化开。后来闺女追问了半宿，他才吞吞吐吐地交了底：“俺老家规矩，没蛋就是不待见……”

来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，按牟平的老规矩，做女婿的——特别是新女婿，得给岳父岳母送五到十斤新鲜鲈鱼。为何送鲈鱼？其实玩的就是一个谐音梗，借鲈鱼祝福老岳父、老岳母身体健康安泰。黄大妈的女儿两天前就到市场挑了五斤刚下船的鲈鱼，银闪闪的，催着女婿上路，可女婿却老大不情愿，迟迟不肯动身。女儿磨了半天才问出根由，原来是那碗没放蛋的面条在作祟。急忙回家跟母亲一说，黄大妈听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直拍大腿：“你说我这老糊涂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她揣着攒了半个月的布票——其中两张还是跟邻居借的——去供销社扯了块红布，把家里积攒下的十二枚鸡蛋全都拿出来放在红布上，又特意托人去把闺女和女婿叫来。当那碗卧着俩荷包蛋、浇着五花肉卤的面条端上桌时，她的手都在抖：“孩子，大娘给你赔个不是，这蛋你得吃下去，咱两家的日子，得像这蛋一样圆圆满满。”女婿看着碗里冒热气的荷包蛋，眼圈一下子红了，端起碗呼噜呼噜吃个精光，末了抹抹嘴说：“妈，这蛋比我亲妈做得好吃多了。”回家后，端午节的前一天一大早，新女婿就亲自上市场选了十条又大又新鲜的鲈鱼给送过来了。

如今鸡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，已一落千丈。但在乡下，新女婿上门吃荷包蛋的规矩却一点也不能含糊。而且还有一个讲究，给新女婿做的荷包蛋，依旧得是自个儿家养的鸡下的才行。她们总说，饲料蛋的蛋黄发柴，哪有自家鸡啄着蚂蚱、刨着麦粒下的蛋香？面条上还是刨两根菠菜，说是“清清白白过日子”。

年轻人或许觉得这规矩老套，可当那碗热面条端过来，看着长辈眼里的期待——像三婶当年盯着新女婿吃面时那样，眼睛里亮闪闪的——谁又能说这只是两枚普通的鸡蛋呢？

乡村记忆

战水荒的日子

张荣起

收拾草棚里的杂物，突然发现一只久违的罐绳钩。六十年前，这只不起眼的物件，曾伴随我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，见证了一个水荒严重村落的吃水景况和战胜水荒的奋斗历程。

那时，北方农民吃水靠从井里汲取，每个村都有先辈留下的赖以生存的水井。水井对百姓来说，则同土地一样重要，粮食充足，则民心安。我妻子的娘家徐家村曾严重缺水，全村300多户，1500多人口，只有两口井，村东头一眼，村西头一眼。每一眼井从地面到水位都有几丈深，逢上旱年，水位还要下降数米，所以每家都备有几丈长的罐绳，专用来排队打水，可见吃水是何等紧张了。罐绳的一端，固定一个特制的铁钩，铁钩有舌条，只要套进桶系，等于上了保险锁，除非连罐绳一起滑进井里，不然水桶是不会单独脱落的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成为徐家村的女婿，因非栖霞籍，家属便暂时定居在这个村里。学校离家有二十二里路，最令我犯难的就是吃水了。每周只能赶上星期天回一次家，为家里备下一周吃用的水，为此，我特地到城里定做了一担大号水桶，离家临走时，总是把水缸、水桶挑满，以减轻妻子的打水负担。

苦的是旱天井里水少，好不容易打上来的半桶水，却像泥汤一样浑浊，需沉淀一宿才能食用，有时年轻人甚至要下井用瓢舀水，舀干以后，待渗点水再汲取食用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妇女洗衣服要到外村找水，或者到亲戚家去洗。天早了，庄稼没水浇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枯死。

1970年初夏，时任县水利局局长的衣培松硬是不信这个邪，为了解决徐家等村的水荒，他派专人到上海购进一台地下水勘探电测仪，并先后派刘祖德等水利技术员到烟台、掖县（今莱州）、福山等地参加省水利厅举办的地下水勘探学习班。这期间，他又邀请烟台水利局和水文站的专家前来会诊，最后选定在村西约二里处的粉子山以东、公路一侧的部位施工。这儿据测水位离地面有十二三米，是最浅的一处，大队决定在此修建一处扬水站。

是年，秋收一结束，挖水塘的战斗就打响了。大队书记徐培强、大队长徐宝川亲自挂帅，指挥施工，全村男女老少120余人齐上阵，刨的刨、挖的挖、推的推、拉的拉，工地上红旗招展，热火朝天。一个冬天，人流不减，冰天雪地，汗流不止，一直干到1971年春节前。大年过后，施工又开始，挖到小麦将熟，随着水塘越挖越深，大家的情绪日趋紧张，因为一旦挖不出水，麦收开始就要停工，汛期来了，无法施工，将会前功尽弃，损失可就大了。水利技术员和大队干部都急得

团团转，于是派人到烟台水文站请专家来现场勘探。专家从黄县（今龙口市）水利工地风尘仆仆地赶来，直奔工地。当他跳进水塘，观察了一阵后，又从湿乎乎的部位捧起沙石辨认了许久，高兴地说：“地下水很快就出来了，你们放心干吧！”这时在场的人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了。又挖了两天，石土层下去两米多，在专家指定的几个方位，湿漉漉的沙石蠕动了。小伙子们高兴得挥舞着镐头，狠狠地刨了下去，随着揭开的酥石棚，几股泉流汩汩涌现，接着几条水龙似的泉流从溶洞中窜出，整个工地欢呼起来，沸腾起来。

又经过半个多月的苦战，一个长50米、宽20米、深12米、蓄水1000立方米的水塘和扬程32米的扬水站建成了，灌溉面积达300多亩。第二年水浇田亩产粮食达到800多斤，比水浇前提高了一倍。

然而，只有这一个水塘，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和农业的需求，离村不足200米的大庄头水泥厂和村办的大理石厂、面粉厂、石子厂等都急需用水。寻找新水源仍是当务之急。

1974年，新任大队书记徐志远上任后，重整旗鼓，继续找水。他与支部、大队干部几经磋商，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，请来省水文站的专家来村会诊，重新确定打井位置，最后决定在村外西泊架机钻井。这个位置靠近河床，属沙质土层，施工难度很大。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松散的沙石，随钻随滑，立不住井壁。针对这个问题，他们当即召开“诸葛亮”会，集思广益，用树条编织一批长筒式筐笼下入管道，抑制沙石的滑落，又用干黏土边钻边填，终于使井壁立住。当钻到80米处，钻头打进了溶洞，陷入了无底洞中，源源不尽的地下水终于找到了！为了充分利用这股地下水，他们又在同一方位，连续钻了5个井口，安装了3台水泵抽水，大大满足了全村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水需求。

为了根治水荒，在西泊打井的同时，他们在距村东二里处的镇泉山西不远处，挖水塘建第二座扬水站。1975年秋收后，全大队抽调100多个劳力在山上安营扎寨，大队书记徐志远、大队长徐滋绍和社员们一起，一日三餐吃在工地，睡在工地，昼夜不停，三班轮流作战，整整苦干了一冬，离春节还有6天，一个长60米、宽30米、深12米的水塘建成了。泉眼比大砂碗口还粗，两台60马力的柴油机同时抽，一天一夜抽不干。春节后，他们又马不停蹄地修建水利附属设施，扬水上山。与此同时，西泊机井也修出几条渠道，有的爬上南山坡，有的流向西山，有的与东扬水站相衔接，这样一来，不管遇到怎样的干旱，哪个方向都有充足的水源，徐家村从此告别了水荒。